

美國政黨政治體質轉變

陳坤森

從客觀環境的變化來看，六〇年代中期以降，美國政黨政治的體質，確實發生明顯的變化。首先，政黨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選民對政黨的心理認同日益式微，而致學者喻為「政黨解組的時代」(era of dealignment)，其對政黨政治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使政黨傳統的功能大為削弱；另一方面也導致選舉浮動性(volatility)變高，影響日後兩大政黨相對力量的消長。

至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取向，也有顯著的變化。由於選民對政黨認同比率的下降，使選民依「政黨認同取向」(party identification orientation)的投票行為，有逐漸沒落的趨勢；代之而起的是依「議題取向」(issue orientation)和「候選人取向」(candidate orientation)的投票行為。另外，自一九六〇年起，民主黨內「新政治左派」(New Politics Left)團體的崛起，導致在社會議題持保守觀點的南方白人、天主教徒和低階層的勞工逐漸背離民主黨；共和黨尚結合一批保守的「新右派」(New Right)團體的支持，而在近年總統選舉取得優勝。在選民意識型態的自我歸屬(self-placement)方面，選民有朝向保守的趨勢。此種「新政治左派」團體和「新右派」團體，在議題上兩極化的對立，以及美國政治主流向右轉的趨勢，無寧亦是美國政黨政治體質的重大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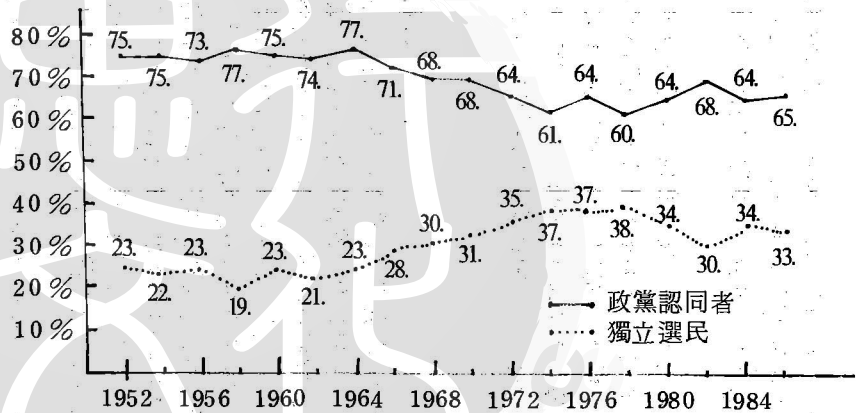
壹：政黨認同的式微

從政治、社會和經濟大環境的變化來看，六〇年代的民權運動、反越戰風潮，以及七〇年代的水門醜聞案(Watergate Scandal)、石油能源危機等，都是醞釀選民政治態度和價值取向做巨幅變動的有力因素。根據Alan I. Abramowitz引用密西根大學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的民意測驗數據，比較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美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發現：六〇年代美國社會空前的動盪與不安，造成美國公民普遍存有犬儒主義(cynicism)和悲觀主義(pessimism)的心態，雖然美國公民政治參與的活動頻率有所增加，但是公民對政治領導人物和政治體系的信任程度，卻急遽下降，並造成公民對政黨認同與忠誠的下降(註①)。

再者，由於制度上的變革，加速政黨傳統的功能趨於瓦解。例如：直接郵寄捐款(direct mail solicitation)方式的興起，和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的快速成長，使得政黨在競選過程中的募款功能逐漸喪失；兩大政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過程，大量採行直接初選制(direct primary system)，因而降低黨務人員及政客對總統候選人提名

過程的影響力；身為「第四權」(the fourth power)的大眾傳播媒體，也逐漸取代政黨，成為塑造候選人形象的重要工具。另外，於一九七一年所通過的第二十一條聯邦憲法修正案，將投票年齡降至十八歲，政黨認同較弱的年青選民，加入投票行列後，無疑使政黨政治的基礎變得更为脆弱，也使選舉的浮動性隨之增高。

政黨認同式微的證據，可從圖一政黨認同者比率的下降和獨立選民 (independents) 比率的上升窺其端倪。密西根大學自一九五二年起，開始對選民的政黨認同，進行抽樣調查，將政黨認同視為選民投票行為的獨立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並予以概念化，而將政黨認同細分成：強烈或微弱民主黨、共和黨認同者，偏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獨立選民，純粹的獨立選民和無政治意識者 (apoliticals) 等八個刻度，做為計算選民政黨認同心理狀態的標準。由圖一的數據顯示：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間，政黨認同者 (包括強烈或微弱民主黨和共和黨認同者) 和獨立選民 (包括偏民主黨或共和黨的獨立選民和純粹的獨立選民) 的比率甚為穩定；但自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間，政黨認同者的比率由百分之七十一降至百分之六十，相反地，獨立選民的比率由百分之二十八增至百分之三十八，八〇年代政黨認同者的比率，雖有所回升，但尚難恢復至五〇年代時的盛況。美國選民政黨認同的式微，至少引起以下幾種效果和影響：



資料來源：SRC/CPS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圖一：政黨認同者和獨立選民的比率，1952~1986

(1) 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的相關性下降。根據米勒 (Arthur H. Miller & Warren E. Miller) 指出：二者的相關係數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六十五，降至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一；代之而起的是依議題和候選人為取向

標準的投票行為 (註②)。

(2) 選民對政黨的評價 (evaluation)，由正面 (positive) 和負面 (negative) 兩極化的評價，逐漸趨向中立性 (neutrality)。渥特伯格 (Martin P. Wattenberg) 研究指出：選民對政黨採中立性評價的比率，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三，突增至一九八四年的百分之三十六 (註③)。

(3) 投票參與率 and 政黨認同強弱，大致呈正比。未參與投票者大都集中在微弱政黨認同者和獨立選民；所以，政黨認同的式微，將間接導致投票率 (turnout) 的下降 (註④)。從官方所發表的投票率數字來看，五〇、六〇年代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大致維持百分之六十左右的高投票率，但隨著六〇年代中期以後政黨認同式微的趨勢，投票率逐漸走下坡，至一九八八年的總統選舉，更降至百分之五十不到 (註⑤)。

(4) 政黨認同的式微，將減弱社會團體對兩大政黨支持的基礎和強度。而日益增高的跨黨投票 (defection voting) 和分裂投票 (split-ticket voting) 旁證政黨認同式微的趨勢，並加深選舉的不穩定性和不可捉摸性。就跨黨投票的比例來說，有愈來愈多的選民背離自己所認同的政黨候選人，而改投另一敵對政黨。五〇年代跨黨投票的比例尚稱平穩；但至六〇年代中期以後，跨黨投票的情形日益普遍，而且大都集中在微弱政黨認同者羣中，連強烈政黨認同者跨黨投票的比例亦有所增

加(註⑥)。相對地，依政黨屬性投票(*party line voting*)的比例，根據密西根大學 SRC/CPS 的統計指出：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聯邦選舉，大致維持穩定的百分之八十比例，但自一九六八年以後，依政黨屬性投票的比例，平均約下滑一成左右。由此顯示出：政黨認同對投票抉擇的支配力，隨著政黨認同的式微，而日漸薄弱。

再就分裂投票的比例來說，亦有愈來愈多的選民在同一選舉年，於各種不同層次的選舉中，投票給不同政黨的候選人，此種分裂投票的盛行，無寧是美國政黨政治另一種新的趨勢。以總統—眾院選舉分裂投票的比例來看，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四年間，大約維持一成五的比例，但自一九六八年以後，則倍增至二成或三成左右的比例(註⑦)。整體而言，跨黨投票和分裂投票的盛行，不祇歸因於候選人個人形象和議題的吸引所致，其真正的關鍵，乃在於自六〇年代中期以後，日益式微的選民政黨認同的趨勢。

貳：選民投票行為的改變

美國投票行為的研究，源自一九四〇年代的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其強調選民社經背景的影響力，係採「社會學研究途徑」(Sociological approach)，並以「小樣本連續抽樣法」(panel study)的方式，來探討選民投票決

定的過程(註⑧)。由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投票行為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論上有不少缺失(註⑨)，而逐漸被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暨政治研究中心(SRC/CPS, 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所取代；該研究中心開始重視心理層面的政黨認同長期因素，但也未忽視候選人和議題取向等短期因素的影響力(註⑩)。除了上述二學派的歸納性質的投票行為研究外，另外一派以當斯(Anthony Downs)為首的演繹性質的「理性抉擇研究途徑」(rational-choice approach)，其基本假設在於：選民是理性的，每個選民都有他的偏好空間(space)，藉以衡量候選人、政黨和議題，做為他投票決定的參考(註⑪)。

綜合過去投票行為的研究可知：早先的研究焦點擺在選民的社經背景和個人特質上。之後密西根大學派研究一九五二和一九五六年總統選舉發現：五〇年代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最受「政黨認同」長期因素的影響，依政策或議題投票的行為尚不多見。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六〇年代美國面臨政社經結構和價值取向的大轉變，政黨認同的比率大幅下降，因此美國選民基於理性的抉擇，依議題偏好而投票的行為，自六〇年代以後，有增加的趨勢。爾後大眾傳播媒體的興起和競選技術的翻新，使候選人開始重視形象塑造，也有越來越多的選民依候選人的能力和品德而投票。

一、政黨認同取向投票行為的沒落

政黨認同為一抽象概念，指涉選民的一種心理狀態，為選民對某一政黨所產生的心理上歸屬或效忠的情感，能引導選民對其所認同的政黨和該政黨的候選人，做有利的正面評價(註⑫)。早期密西根大學投票行為研究，曾將政黨認同視為長期力量(long-term forces)，為支配選民投票取向最重要的因素。該大學政治系教授康渥斯(Philips E. Converse)從事投票行為研究時，區分投票行為的兩大要素，一是「投票常模」(normal vote)，指涉如果不受候選人魅力或議題偏好等短期因素的影響，以及投票率一切正常的條件之下，則政黨認同長期因素將成為決定投票結果的唯一因素，此時政黨的得票率可被精確地計算出來；另一是「投票常模的變異」(deviation from the normal vote)，乃因受短期因素的介入，使某一選舉年的投票常模發生變異。康渥斯舉一九五二年總統選舉為例，他透過「投票常模」的概念，精密地預估約有百分之四十四的新教徒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天主教徒會投票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個人羣眾魅力之短期因素的影響，使原先預估的「投票常模」發生變異，導致當年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新教徒和百分之五十一的天主教徒投票支持民主黨的史蒂文生(Stevenson)，其間各約有百分之十三的投票變異(註⑬)

由康渥斯的研究可知：政黨認同為影響投票行為的長期穩定力量，但也可因短期因素的介入，而削弱其影響力。整體而言，五〇年代「投票常模」的變異，只是短暫的效果而已，待短期因素一消失，政黨認同對投票行為的支配，又恢復往昔強而有力的影響力。直至六〇年代，美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等大環境發生劇烈變化，並有許多引人爭議的事件，如民權運動、越戰、水門事件和石油危機等，因此美國選民依「議題取向」的投票行為，自六〇年代以後有增加的趨勢。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言，政黨的重要性，自六〇年代以後，有衰微的趨勢，而使政黨認同取向的投票行為有下降的跡象。此跡象可從日益增多的分裂投票行為和跨黨投票得到佐證。奈(Norman H. Nie)等人在其「轉變中的美國選民」(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一書中，即曾指出

「政黨取向投票行為下降的原因有二：獨立人士人數的增多和跨黨投票比率的增加；同時，議題取向投票行為反而崛起的原因也有一個類似的原因：愈來愈多的選民有較為一致的議題立場，而這些選民也愈來愈受此議題立場所導引而投票。」(註⑭)。

另外，根據舒曼(Mark A. Schulman)和龐伯(Gerald M. Pomper)對一九五

六、一九六四和一九七二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所做的「因徑分析」(path analysis)發現：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的相互關係(correlation)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而議題與投票抉擇的相互關係則增加了四倍(註⑮)。哈特維格(Frederick Hartwig)等人，對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總統選舉所做的「標準化迴歸分析」(standardized regression analysis)也發現：依政黨投票的行為正逐年下降，代之而起的是議題和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行為(註⑯)。

二、議題取向和候選人取向投票行為的興起

基氏(V. O. Key, Jr.)研究一九三六至一九六〇年總統選舉的投票行為時發現：選民並非愚者(voters are not fools)，在大部分選舉中，選民能理性地評估政策執行的後果，而做出負責任的投票行為(註⑰)。基氏的修正觀點，無疑給早期以「政黨認同」馬首是瞻的學者，一記當頭棒喝。基氏的研究雖頗為中肯，但是其所依據的資料大都採自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做回溯分析，所以立論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雷帕斯(David E. RePass)引用SR C/CPS的資料，對議題投票的重要性進行重估發現：早期問卷調查的問題，大都集中在政黨認同和候選人評價，也較少問及對議題的看法；無怪乎，調查的結果，依議題取向的受試者較少，即使有議題看法的問題，大部分都

是研究者已經安排好的「封閉式問卷」(closed questionnaire)，受試者無法主動回答對議題的其它看法，因此有低估議題取向投票行為的嫌疑(註⑱)。龐伯分析一九五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意測驗資料也發現：一九六〇年以後，議題日益凸顯其重要性；受試者對SR C/CPS所問關於聯邦政府是否應介入教育補助、醫藥保健、就業保險、就業機會平等、黑白合校和援外計劃等六項爭議性問題，受試者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已愈能區分兩大政黨在上述六項爭議性問題立場的差異，而且選民議題立場與其政黨認同的方向，也較過去一致(註⑲)。往後學者對議題取向投票行為的研究大抵同意：議題取向的比例，雖尚不及政黨認同的比例，但前者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後者的影響力似乎逐漸式微。

根據哈特維格對選民投票行為分析發現：近年來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影響投票抉擇甚巨，似乎有逐漸取代政黨認同，成為影響投票抉擇的最重要變數。近年來，大眾傳播媒體支配整個競選活動的進行，媒體競選廣告、由電視辯論和選舉民意測驗，成為選民判斷候選人形象、操守和能力的重要依據，傳統依政黨認同而投票的行為日益減少，依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行為反而日益增多。一九八四年雷根再度連任總統，學者米勒將此勝利歸因於雷根的個人特質的吸收力和任內政績的表現(performance)，而不是支持他的政策立場或是共和黨的政綱承諾(註⑳)。渥特伯格即形容：政

黨功能的持續衰退，不管將來是由民主黨或是共和黨執政，都將促使以「候選人為中心」(candidate-centered)的競選年代的來臨(註⑳)。

政黨認同取向投票行為的沒落，依議題或候選人取向而投票的比例，日益增多。此種選民投票行為的改變，對兩大政黨相對力量消長，所造成的影響，可分三方面來說：

(1) 政黨認同的式微，所引起政黨認同取向投票行為的沒落，將使政黨選民支持力量的基礎，變得飄浮不定，影響所及，將使無任何一個政黨能夠整合選民的力量，形成如基氏所言之「新而且持久的選舉團體」(new and durable electoral groupings)(註㉑)。

(2) 依議題取向的投票行為，根據卡門斯(Edward G. Camines)的指出：在六〇年代因種族議題(racial issue)的兩極化，而有所增加，且可為另一次政黨重組的發生，設下動力(註㉒)。可惜因後繼無力，而且經濟議題沖淡昔日種族議題的重要性，而未能使兩大政黨的相對力量，做巨幅的變動。

(3) 依候選人取向的投票行為，將使選舉結果依候選人形象和吸引力而異。其對政黨相對力量消長的影響，充其量，只能產生短暫的「表現型政黨重組」(performance realignment)，意指某一政黨的選舉優勢，只能歸功於現任者的政績表現，而非對該政黨政策的認同，倘若候選人政績表現，一旦陷入困境，則此「表現型政黨重組」的基礎，將立即崩潰

(註㉓)。

參：政黨新舊議題的對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工業先進國家的經濟復甦，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導致有些政治社會學者，如李普塞(Seymour M. Lipset)會將此富裕的時代，稱之為「意識型態終結」(end of ideology)的紀元(註㉔)。但至六〇年代，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平等權運動和各種形式的示威遊行等，所造成的不穩定的政治、社會秩序狀態，使「意識型態終結」的概念，遭到來自「新左派」(New Left)和「多元主義論者」(pluralist)的強烈質疑。

就大眾所關心的議題(issues)而言，六〇年代以前，其注意的焦點大都集中在經濟層面和國際事務層面；而六〇年代以後，新興的中產階級和具有批判性格的知識份子，將其所關心議題的視野，漸轉移至非經濟層面，諸如：社會、文化和環保問題上。英格赫特(Ronald Inglehart)曾引介「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的概念，來區分西方國家新、舊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差異；他指出：物質主義左派(materialist Left)來自下層階級渴望分配經濟利益大餅的一羣；而後物質主義左派(materialist Left)則集中於中產階級家庭，注重生活品質和非經濟層面的議題(註㉕)。

一、「新政治左派」團體的崛起

英格赫特的「後物質主義」概念，可以部分解釋崛起於六〇年代美國的「新政治左派」團體。此一新興的政治團體，具有強烈「反當權者」(anti-establishment)傾向，其所關注的議題大都集中在非經濟層面上，例如：少數民族和婦女的平等權利、和平的國際關係、人類尊嚴的維護、純淨的生活環境和高尚的文化等；其成員涵蓋弱勢團體(如：黑人、西班牙語系族裔、年青人、婦女)和部分教育水準高的中、上階級知識份子(註㉖)。「新政治左派」團體的產生，造成民主黨和共和黨意識型態的重整運動，並引起兩大政黨社會團體支持力量的游動。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共和黨開始向右轉，吸引一批新的保守主義聯合份子；另一方面，民主黨則開始向左轉，使得該黨得以吸收一羣自由派的選民，形成「新政治聯盟」，也因此和在非經濟層面議題，持保守觀點的部分「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成員發生嫌隙。

民主黨於三〇年代所建立的「新政聯盟」，其主要構成份子為：南方白人、天主教徒、低階層勞工、猶大教徒、黑人和都市新移民等，使民主黨在羣眾基礎方面，近似「全民政黨」(everyone party)。早期的「新政聯盟」成員與民主黨的關係，大都建築在經濟層面的議題上。例如：對私人大企業的管制、運用政府力量促進勞工的經濟地位以及擴大經濟安

全的層面和社會福利的範圍等，成爲所謂的「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舊左派 Old Left)的訴求重心。直至六〇年代，由富足新生代的「雅痞階級」和少數民族團體所倡言的「新政治自由主義」(New Politics Liberalism·新左派 New Left)，其所訴求的重心轉向社會和文化層面的議題上，而和部分「新政聯盟」的成員：南方白人、天主教徒和低階層勞工的價值取向有所抵觸。

二、「新右派」團體的反擊

早期南方白人、天主教徒和低階層勞工，因其社經地位皆處於劣勢，所以在許多經濟的觀點，和民主黨的自由傾向的經濟政策相容；但是強調社會和文化議題的「新政治」團體，其激進的種族平等和人權的觀點(如：反對種族隔離、贊成墮胎合法化、廢除死刑等)，基本上皆和在社會議題上持保守觀點的南方白人、天主教徒和低階層勞工的道德價值不能相容。於是，保守派份子結合上層階級對經濟議題採保守主義者，和中下層階級對社會問題採保守主義，形成一股「新右派」(New Right)運動；但基本上，新右派是以中下階層爲主的草根性運動(Grass root movement)，本質上是屬於民粹主義(Populist)的「沈默多數」(Silent majority)集結運動(註⑳)。

新右派人士認爲現代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世

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是造成今日美國道德淪喪的根源，所以新右派人士主張運用政府的力量，來保護傳統的道德與價值；因此新右派有部分成員來自最保守的基督教「原始教義派(fundamentalists)」和「福音教派」(evangelicals)，他們反對墮胎合法化、反對通過男女平等憲法修正案(ERA)、反對車載學童(busing)的黑白混合學校方案、贊成建立強大國防以重振國威和抑制共產主義的擴張等等。近且新右派團體想藉由支持共和黨的行動，建立起全美的「保守主義大聯盟」(conservative grand coalition)。

一九六〇年代是美國新舊政治的分水嶺。一九六四年共和黨提名極端保守的高華德競選總統，說明該黨開始背離過去中間溫和的傳統，也使忠於意識型態的年輕而具行動力的保守團體紛紛誕生。而民主黨在甘迺迪和詹森政府任期內，爲迎合「新政治團體」的要求，採取自由色彩的民權改革方案，也因此疏離保守的南方白人選票。而「新右派」力量整合另一契機是保守的白人團體對黑人民權運動的反撲行動；一九六八年，中、下階級保守勞工和南方白人，曾給予美國獨立黨(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候選人華勒斯(George C. Wallace)百分之十三的選票，並促使溫和和派的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當選總統，顯示保守的白人團體對民主黨自由色彩的社會政策和種族政策的強烈不滿，並抵制以自由思想與反

抗文化(counter-culture)爲特色的「新政治團體」勢力的擴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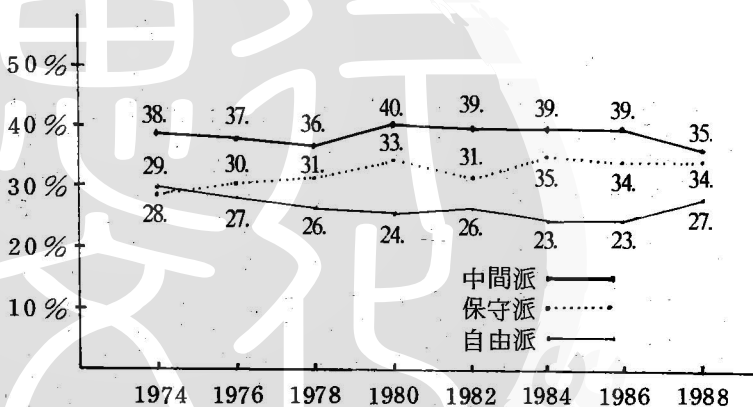
「新政治團體」占據下的民主黨，使民主黨由新政時期「全民政黨」的地位，退到只是黑人和自由激進份子的聯合體，使民主黨難以整合政黨各派系的意見，形成共識的政綱，而導致民主黨在總統選舉力量分散，造成入主白宮的一大障礙。另外，民主黨總統初選盛行採依黨員屬性分配比率代表制(categorical representation)，使少數民族族裔、年青人和婦女等自由色彩較濃的團體，得以大量被選爲全國代表大會(national convention)的代表。根據一項針對一九八四年出席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意識型態自我歸屬，所做的民意測驗發現：有高達百分之五十的代表自稱是自由派，百分之四十二的代表自稱是中間派，而僅有百分之五的代表自稱是保守派(註㉑)。

由此民主黨推舉總統候選人的全國代表大會自由傾向的代表結構，和保守傾向的選民結構來看，民主黨推派自由派色彩的總統候選人，卻難以獲得選民認同的現象，自不難想像。無怪乎，保守的南方白人、天主教徒和低階層的白人勞工等傳統民主黨「新政聯盟」的成員，發展出「二套投票系統」(two-tier system of voting)，而總統層次的選舉，投票支持保守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而在國會和地方層次選舉，則仍大部分擁護意識型態屬中間派或中間偏右的民主黨候選人。

三、選民意識型態的轉向

近年來，各種民意調查機構對美國選民意識型態歸屬所做的測驗均顯示：美國政治主流有向右轉的趨勢。密西根大學 SRC/CPS 於一九七二至一九八四年所做的選民意識型態歸屬發現：自認保守派選民的比率，平均約比自認自由派選民的比率，多出百分之十左右。另外，全國民意調查中心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也發現類似的結論：一九七四年自認自由派選民的比率，尚比自認保守派選民的比率，多出一個百分點，但之後保守派選民的比率，反而拉近其與自由派選民比率間的差距，兩者的差距平均維持在百分之十上下，一九八三年，此差距曾一度達到百分之十七！（見圖二）

依選民意識型態向右轉的趨勢來看，米勒曾指出：如果保守的民主黨認同者，因對民主黨自由傾向的政策日益疏離，而逐漸改變他們的政黨忠誠方向，進而倒戈至共和黨陣營，長久累積下來，將導致兩大政黨相對力量發生重組，米勒將此現象稱之為「意識型態的政黨重組」(ideological party realignment) (註②)。然而，美國選民意識型態向右轉的現象，是否能持久？曾引起廣泛的討論。根據一項針對參加一九八一年美國政治學會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年會的政治學者，所做調查測驗指出：與會的政治學者都承認美國政治主流向右轉的趨勢，但



資料來源：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圖二：選民意識型態的自我歸屬

是有百分之六十七與會的政治學者認為這只是個短暫的現象，並不會持續太久（註③）。誠然，由圖二可以得到一些證據：美國選民意識型態的自我歸屬，自認為保守派選民的比率，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確實占上風；但是由近年來的跡象顯示，自認為自由派選民的比率又逐漸復甦。以去年一九八八年所做的民意

測驗來說，自認為自由派選民的比率，又回升至百分之二十七，其與保守派選民比率的差距，縮小至百分之七左右。

面臨六〇年代以來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的鉅變，美國政黨政治體質確已與往昔不太一樣。選民政黨認同的強度大為削弱，反映在投票行為方面，造成依「議題取向」和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競選時代的降臨，政黨對選民投票取向的支配力有下降的趨勢。再者，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自六〇年代末期，有逐漸向右趨向保守的現象。兩大政黨對於主要議題的看法，也呈現自由、保守兩種光譜；由於選民結構的改變，民主黨所推出的自由傾向的總統候選人，似乎不再討好沈默的保守多數 (silent conservative majority)，而導致民主黨在最近的六次總統大選（一九六八—一九八八年），喪失五次入主白宮的機會。

註釋

註①：Alan I. Abramowitz,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Stress,"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pp. 188-202.
 註②：Arthur H. Miller & Warren E. Miller, "Issue, Candidates and Partisan Divisions in 1972 Ame-

- 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October 1975): 422.
- 註③·Martin P. Wattenberg,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1952-1984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5-157.
- 註④·William Crotty, American Parties in Decline, 2nd 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4), pp. 7-15.
- 註⑤·Congressional Quarterly 47 (Jan. 21, 1989): 135.
- 註⑥·Crotty, op. cit., pp. 7-15.
- 註⑦·Wattenberg, op. cit.,
- 註⑧·Paul F. Lazarsfeld et al.,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 註⑨·哥倫比亞大學派在研究方法和方法論上的缺失有：(1)其研究焦點在於社會羣體，因此不能深入瞭解個人的投票取向；(2)沒有進一步解釋不同社羣的投票差異；(3)也沒有進一步解釋同一社羣在不同選舉時間，為何會改變投票行爲。
- 註⑩·Angus Campbell et al., The American Vote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0).
- 註⑪·所謂理性假設是指：當選民面對許多選項 (alternatives) 時，能夠依偏好順序加以排列，當他再面臨同樣的選項時，他永遠會選擇第一個好。請參閱：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57)。
- 註⑫·Herbert B. Ashe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American Politics, 4th ed. (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8), p. 41.
- 註⑬·Philip E. Converse, "The Concept of a Normal Vote," In Angus Campbell et al.,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6), ch. 2. 最新有關「投票策略」的探索，請參閱：John R. Petrocik, "An Expected Party Vote: New Data for an Old Concep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February 1989): 44-66.
- 註⑭·Norman H. Nie,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Enlarged e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91.
- 註⑮·Mark A. Schulman and Gerald M. Pomper, "Variabil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from Causal Model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February 1975): 1-18.
- 註⑯·Frederick Hartwig et al., "Variabil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August 1980): 553-558.
- 註⑰·V. O. Key, Jr.,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7-8.
- 註⑱·David E. RePass, "Issue Salience and Party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June 1971): 389-400.
- 註⑲·Gerald M. Pomper, "From Confusion to Clarity: Issues and American Voters, 1956-1968,"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June 1972): 415-428.
- 註⑳·Warren E. Miller, "The Election of 1984 and the Future of

- American Politics," In Kay L. Schozman eds., Elections in America (Boston: Allen & Unwin, Inc., 1987), pp. 296-303.
- 註②③·Wattenberg, op. cit., p. 168.
- 註②③·V. O. Key, Jr.,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17 (February 1955): 3-18.
- 註②③·Edward G. Carmine and James A. Stimson,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 (March 1980): 78-91.
- 註②③·Paul Abramson, John H. Aldrich and David W. Rohd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1984 Election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6), p. 5.
- 註②③·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ed.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 13, 15.
- 註②③·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註②③·Warren E. Miller and Teresa E. Levitin, Leadership and Chang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rom 1952 to 1976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84), pp. 1-6.
- 註②③·Linda J. Medcalf and Kenneth M. Dolbear, Neo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65-183.
- 註②③·Barbara G. Farch, "Delegate Polls: 1944 to 1984," Public Opinion 7 (August/September 1984): 44.
- 註②③·Miller, op. cit., pp. 294-337.
- 註②③·Ada W. Finifter,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 C.: The APSA, 1983), p. 110.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

政治心理形成與政治參與行為

林嘉誠 著

一七一元

本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權力取向；第二，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權力取向部分，除了說明相關理論之外，並實證調查了解政治社會化過程，各種政治權力取向。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部分，也是闡述有關理論及施測各種政治態度與政治參與行為。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37號
郵政劃撥：000016511號
電話：三二六一八三二一五五三八
傳真：(02)371-0174